

从集赋到赋集：汉魏六朝赋的一个考察视角

孔德明, 刘学智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汉代皇家通过献赋与民间搜集等方式,收集整理了大量赋篇。魏晋时期,在收集与整理赋篇的基础上,赋集初步形成。南北朝时期,真正具有完全意义上的赋集生成,且数量颇丰。从集赋到赋集,是人们对赋作文体特点的认识逐步深入和全面的过程,也是人们赋体观念意识慢慢明晰、凸显而成熟的过程。

关键词:汉魏六朝赋;集赋;赋集;文体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4)05-0089-04

From Collect Fu to Collection of Fu: A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Fu in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KONG De-ming, LIU Xue-zhi

(College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214, China)

Abstract: The royalty of Han dynasty collected a large number of Fu by private offering and collecting from the public. The collection of Fu showed its initial formation shape on the base of collection and arrangement in Wei and Jin period. The real collection of Fu with considerable quantity was crea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 The process from collect Fu to collection of Fu was the gradual and all-round deepening for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Fu and was creators' concepts about Fu was gradually clear and mature.

Key words: Fu in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Collect Fu; collection of Fu; stylistic meaning

赋兴于楚而盛于汉,成为汉代之文学代表。自汉始,赋作的搜集整理已被重视。降及魏晋至南北朝,赋作的搜集整理更为盛行,且出现了大量赋集。赋集的出现,不仅在文献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文体学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集赋到赋集,厘清赋集之形成过程,从而作为汉魏六朝赋的一个考察视角,阐释其文献学及文体学意义,无疑是一件有价值而值得做的事情。

汉朝历代皇帝大都注重典籍的整理收藏,汉赋的整理收藏也是典籍收藏中很重要的一项。汉代皇家所藏汉赋文本的搜集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赋家自献于皇帝;通过州郡上计的方式搜集;派使者、谒者于赋家家中或民间搜集;乐府机构的采集等。

对汉赋的搜集整理至迟始于汉武帝时期。《汉书·艺文志》云:“迄孝武世……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1]1755}又《太平预览》卷八八引《汉武故事》云:“上少好学,招求天下遗书,上亲自省校,使庄助、司马相如等以类分别之。”^[2]辞赋当在搜集整理之列,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

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3]看来,此赋不是司马相如亲自上献的。正如王芑孙所说“非由自献”^[4],极可能是汉武帝从民间搜罗而得,或为王侯官吏所献。武帝好辞赋,故言语侍从之臣日月献纳,公卿大臣御史大夫时时间作。他们所献之赋亦应被写书之官钞集整理。

此外,乐府采诗也是搜集整理诗赋的一个途径。《汉书·艺文志》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1]1756}徐中玉说:“民风当然不只反映在诗里,这‘诗’字,不但不只指《诗经》和《诗经》未收入和后出的,其实包括了一切民间的创作,口头的书面的,有韵的和无韵的,各种体裁和样式的。”^[5]徐氏之说,甚为有理。乐府所收歌谣,经文人整理,或诗或赋。《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1]1701}《汉书补注》引周寿昌曰:“相如死当元狩五年,死后七年延年始得见(元鼎六年)。是相如等前造诗,延年后为新声,多举者,言举相如等数十人之诗赋,非举其人也。”^[6]如周说不误,则相如造诗赋在前,而延年谱新声在后,有些诗作未入律之前即为赋作。

宣帝依武帝故事,倡导辞赋,王褒、刘向、张子侨

收稿日期:2014-05-15

作者简介:孔德明(1972—),男,河南新县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汉魏六朝辞赋研究;
刘学智(1956—),男,河北保定人,讲师,主要从事古文字学、训诂学研究。

之徒日月献纳。至成帝时,赋作便至千余篇。《汉书·艺文志》云:“至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1]1755}其中刘歆“序诗赋为五种”,“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1]1756},除却内含“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1]1756},赋则逾千篇,可见皇家所藏赋作之丰。此千篇赋作包括楚辞,后刘向从中离析出楚辞,另为一部。他以屈原、宋玉的作品为主,加上西汉文人模仿的作品,称为《楚辞》。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哀屈、宋诸赋,定名为‘楚辞’,自刘向始也。”^{[7]1973}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介绍了《楚辞》的编辑经过,以及与王逸本的传承关系。可见,《楚辞》集成于西汉末,而定型于东汉。

东汉亦时有献赋之举,明、章帝时期尤盛。文臣所献赋颂往往下之史官,藏之渠阁。如《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云:“(刘京)数上诗赋颂德,帝嘉美,下之史官。”^{[8]1451}“下之史官”,便是入库收藏了。这说明当时的皇帝都是很注重文学类作品的搜集和收藏的。灵帝时,成立鸿都门学,献赋更盛。《后汉书·酷吏列传》载:“案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免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乌篆盈简,而位升郎中。”^{[8]2499}另外,皇家亦集赋于民间。王充《论衡·佚文》云:“今上(章帝)即命,诏求亡失,购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声。”^{[9]313}其本人又好“左右艺文,斟酌律礼”,故所募求佚文或有赋颂之篇。又《后汉书·张堪传》:“帝尝召见诸郡计吏,问其风土及前后守令能否。”^{[8]1507}计吏向神口占“民所疾苦”,“帝尝召见诸郡计吏,问其风土及前后守令能否”,计吏亦必口占,口占即为赋。《汉书·艺文志》所录杂赋中某些赋作,如“杂四夷及兵赋二十篇”“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十六篇”“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杂器械草木赋三十三篇”等^{[1]1752},有可能就是上计吏口占当地的风土及百姓疾苦之作。由他们口占而由写书之官记录,然后下之史官。失录姓名,遂成无主之作。王逸曾为上计吏,其《机妇赋》《荔枝赋》二篇,或为上计口占风土之作。东汉对书籍的校定整理更加频繁,如明帝、章帝两朝,以班固、贾逵、傅毅三人为主,并孔僖、杨终等诸多文学之士先后参与,对国家藏书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校理。^[10]安帝时,邓太后临朝称制,诏刘珍、马融等校书东观。桓、灵之世,蔡邕入主东观,校书活动亦未辍。东汉校书虽以校定《五经》典籍为主,亦兼带诸子传记、百家艺术,则赋颂之作亦在其中。

两汉时期,除了皇家倾力于辞赋的搜集整理外,私人亦有藏书集赋者。西汉时,私人藏书主要集中于宗室藩王,如河间王刘德与宗室刘向等即藏书甚众。除了宗室诸王贵族外,尚有朝臣官吏、学者经师及其他富户平民藏书者,其中著名的有张敞、文不

识、孔安国、楼护等。东汉私家藏书,更盛于西汉。藏书者由西汉的宗室贵族向学者平民转移,史有明文记载的最著名的有蔡邕、杜林、郑玄三家。桓谭、梁子初、杨子林、班彪、班固、曹曾、任末、董谒、郭泰、蔡琰诸人也各有藏书。其中不乏刘向、班固、蔡邕这样的大赋家,由此而论,他们所藏书籍文章,应包括赋作。萧绎《金楼子·立言》云:“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二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11]清人纪昀则认为文人别集始于东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始于张融《玉海》。”^{[7]1981}“别集”者,一家之所著述,亦即个人诗文集,而非经史传注、考订、义理之作,凡纯为词章之学,都可称之为“别集”。别集集合一家之作,所收集的内容最为齐全。既然如此,则赋作必录其中。如《后汉书·文苑传》(上)云:“毅早卒,著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凡二十八篇。”^{[8]2613}又《后汉书·文苑传》(下)云:“(张升)著赋、诔、颂、碑、书,凡六十篇。”^{[8]2628}由此推之,此时别集收录文章或许以类相次。这为后来赋从文集中析离而出而单独成集作了准备。

二

曹魏时期,帝王、文人均注重对文章诗赋的搜集整理。《后汉书·孔融传》云:“魏文帝深好融文辞……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8]2261}又《与吴质书》云:“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12]591}由此可知,曹丕曾把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人的篇章结集成书。建安七子之中,除孔融外其余几人均有赋作留下。由于曹丕的及时搜集整理,较之前代赋家,建安文人所存赋作可称繁富。曹丕除了把文人的篇章结集外,还命缪袭、王象等编订类书——《皇览》,这其中也保留有大量的赋作。《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云:“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13]75}又《三国志·魏书·杨俊传》裴注引《魏略》云:“(王象)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13]608}其中收存有事类赋。不仅魏国曹氏父子倾心收集赋作,蜀国亦有收集赋篇者。《三国志·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譙郤传》云:“(郤)正本名纂。……性淡于荣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马、王、扬、班、傅、张、蔡之传遗文篇赋,及当世美书善论,益部有者,则钻凿推求,略皆寓目。……依则先儒,假文见意,号曰《释讥》,其文继于崔骃《达旨》。……凡所著述诗论赋之属,垂百篇。”^{[13]961}“司马、王、扬、班、傅、张、蔡之传遗文篇赋”,或散见,或聚集,其读后当收集之。

降及两晋,尤重文章的搜集整理。其最为重要

的是,文章总集的编录出现于此时。《晋书·荀勖传》:“俄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14]¹¹⁵⁴阮孝绪《七录序》云:“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录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15]³³⁴⁵又《艺文类聚》卷四十三引刘向《别录》云:“有《丽人歌赋》,汉兴以来善雅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哀,盖动梁尘。”^[16]如张华与荀勖依刘向《别录》而整理记籍,则内含赋篇。又《晋书·挚虞传》:“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14]¹⁴²⁷挚虞之《文章流别集》,便是总集之始。《隋书·经籍志》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17]⁹⁹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云:“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哀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7]²⁵⁹⁸可见,总集之作从《诗经》开始,继而《楚辞》。而《诗》列为经部,《楚辞》又别列一家,不在总集之内。挚虞编选前人作品,删除芜乱篇章,自辞赋以下,各为条贯,合编为《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称为总集的模板。

魏晋时期是从集赋到赋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赋集或初步形成于此期。陆云《与兄平原书》云:“今送君苗《登台赋》,为佳手笔,云复更定,复胜此不?知能逾之不?其人推能兄文不可言,作文百余卷,不肯出之。视仲宣赋集《初征》、《登楼》,前即甚佳,其余平平,不得言情处。”^[18]此处“仲宣赋集”是不是已经为完全意义上的赋集,匱于资料佐证,不能断言,但亦不可否定。因为,这个时期已有十分适宜赋集生成的环境。《三国志·文帝纪》注引胡冲《吴历》曰:“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餉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13]⁷⁶曹丕单以诗赋赠与孙权和张昭,而不杂含其他文体作品,这对赋集的生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说曹丕赠诗赋与孙权和张昭,为诗赋单独成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则曹植赠赋与杨修便可看作赋集生成的前奏。曹植《与杨德祖书》云:“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12]⁵⁹³又《前录序》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15]¹¹⁴³由上我们可以发现,曹植是有意识地对赋作结篇成集。因此,王粲赋集出现于魏晋时期,也应是情理中事。

三

真正具有完全意义上的赋集生成于南北朝时期,在南朝宋时期已然定型,梁时较为繁盛。南朝献

赋之风不仅未绝,反而有勃兴之状。尤其是宋孝武帝与梁武帝时期,献赋之风更为盛行。《宋书·武三王传》云:“时世祖严暴,义恭虑不见容,乃卑辞曲意,尽礼祇奉,且便辩善附会,俯仰承接,皆有容仪。每有符瑞,辄献上赋颂,陈咏美德。”^[19]《南齐书·皇后传》云:“吴郡韩兰英,妇人有文辞。宋孝武世,献《中兴赋》,被赏入宫。”^[20]因孝武帝严暴,以赋颂政。王臣们便曲意相接,纷纷献赋。梁武帝当政时间较长,天下亦颇太平,故赞颂之赋亦不少。《梁书·文学·袁峻传》云:“高祖雅好辞赋,时献文于南阙者相望焉,其藻丽可观,或见赏擢。”^[21]⁶⁸⁹又《梁书·文学·周兴嗣传》云:“高祖革命,兴嗣奏《休平赋》,其文甚美,高祖嘉之。”^[21]⁶⁹⁷南朝各代对于文章的搜集整理也依然未辍。如宋明帝在藩时曾撰《江左以来文章志》;王俭曾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等。更有甚者,对《汉书·艺文志》所载诗赋亡其文者进行补作。《梁书·张率传》云:“少好属文,而《七略》及《艺文志》所载诗赋,今亡其文者,并补作之。”^[21]⁴⁷⁹这充分反映了诗赋在当时的地位与影响。南朝文人别集更加繁富,“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后,名目益繁”^[7]¹⁹⁸¹。别集之中,赋作不乏。现存最古之总集——《昭明文选》,即编成于南朝梁。书中选录上至楚、汉,下逮齐、梁,三十一位知名赋家所作赋五十六首。以类相从,共十五类。分类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或从此可见南朝赋集编排体例之一斑。

北朝亦有好文之皇帝,如魏孝文帝拓跋宏便是一位好文之君。《魏书·高祖纪》云:“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22]¹⁸⁷又如北齐文襄帝、周明帝等,均博览群书,好属文。因帝王好文,故臣子常有献赋之举。如《魏书·高允传》云:“允上《代都赋》,因以规讽,亦《二京》之流也。”^[22]¹⁰⁷⁶又《北齐书·魏收传》云:“收上《皇居新殿台赋》,其文甚壮丽。时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23]⁴⁹⁰北朝君主与学士也十分注重文章典籍的收集整理。《魏书·李先传》云:“太祖于是班制天下,经籍稍集。”^[22]⁷⁸⁹《北齐书·杨愔传》云:“愔所著诗赋表奏书论甚多,诛后散失,门生鸠集所得者万余言。”^[23]⁴⁶⁰《周书·寇俊传》云:“时军国草创,坟典散逸,俊始选置令史,抄集经籍,四部群书,稍得周备。”^[24]⁶⁵⁹他们在整理文章集时,已有人将赋作单独集录,并流传于世。如《周书·柳庆传》云:“庆幼聪敏,有器量。博涉群书,不治章句。好饮酒,闲于占对。年十三。因曝书,僧习谓庆曰:‘汝虽聪敏,吾未经持试。’乃令庆于杂赋集

中取赋一篇,千有余言,庆立读三遍,便即诵之,无所遗漏。”^{[24]370}可见,北朝赋集已然成熟。

《隋书·经籍志》载录南朝所编主要赋集有:《赋集》九十二卷,谢灵运撰;梁又有《赋集》五十卷,宋新渝惠侯撰;《赋集》四十卷,宋明帝撰;《乐器赋》十卷;《伎艺赋》六卷,亡;《赋集钞》一卷;《百赋音》十卷,宋御史褚诠之撰;《历代赋》十卷,梁武帝撰;《围棋赋》一卷,梁武帝撰;《皇德瑞应赋颂》一卷,梁十六卷;《五都赋》六卷;《杂都赋》十一卷;梁《杂赋》十六卷;梁有《赋音》二卷,郭微之撰;《杂赋图》十七卷,亡;《献赋》十八卷。《隋书·经籍志》载录北朝所编主要赋集有:《赋集》八十六卷,后魏秘书丞崔浩撰;《续赋集》十九卷,残缺。^{[17]1083}由此可推见,南北朝时期赋集编订之概况,亦可认定此期为赋集之成熟期。

四

从集赋到赋集,使得大量的赋作得以保存,且省览者之劳倦。即使有些赋篇已佚,但还有存目可寻,依然可以此推见当时之创作状况。因此,其在文史与文献学上的贡献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故毋庸细论。从集赋到赋集,在文体学上有着十分重要而又往往令人疏忽的意义,它和赋体观念的形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西汉末刘向辑校诗赋,尽管诗赋离析,各为一部,但其赋略所集包括楚辞与赋颂,混而杂之。这与西汉时赋体观念宽泛,辞、赋、颂统称或混称相关联。后刘向从所集赋作中离析出楚辞,哀为一集,使得赋体文学向纯粹性迈出了一大步,也使得人们对赋体形成一个与以往不同、更加纯粹的观念。同时,这些赋作可以让文人学者对赋的文体特点及文体功用有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像西汉末的扬雄与东汉前期的班固都曾对赋有较深刻的认识,扬雄总结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赋体特点。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叙述了赋体文学的源流、演变及其“咸有恻隐古诗之义”与“竞为侈丽闳衍之词”的特点。这些赋体特点的总结都是建立在大量阅赋的基础上的,扬雄曾长时间阅书于石室并校书于天禄阁,班固亦曾校书于东观,他们应该是见过刘向编辑的这上千篇的赋作的。较之前人论赋,他们显然对赋体特点的认识更深入。西汉前期的司马相如和汉宣帝,只是从赋体文学的创作和功用上来论说,虽亦论及赋体的特点,但十分感性,不够深入。如司马相如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从创作的角度谈论作赋之法:“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25]146}汉宣帝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喜”^{[1]2829},揭示了辞赋的教化功能和愉悦功能。

魏晋时期是一个文体意识非常凸显的时期,这

个时期刚好也是赋集生成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汉末至魏晋,辞赋转繁,赋作更加个性化,题材更加广泛化,手法更加多样化,文辞更加绮靡化。颂体在这个时期被从赋体中剥离出去了,使得赋体内核更加精粹,赋体意识更加凸显。曹丕提出文章本同末异,四体八类,“诗赋欲丽”^{[12]720}。陆机认为“体物而浏亮”为赋体特点。^{[12]241}他们均从文体的类型化特点出发来论述赋体文学的特点。挚虞对赋体特点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他既继承了赋为“古诗之流”之说,从“情义”与“事类”两个方面对赋体特点进行阐释,同时他又发现“今之赋”具有“四过”的特点,即“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等。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是以其所撰《文章流别集》为标的的,其《流别集》应是其发论的基础,所以他的赋论亦是在其所集赋作的基础之上生发的。由于魏晋时已出现个人赋作勒篇成集单行的现象,如曹丕专以诗赋赠与孙权、张昭,曹植专以赋作一通赠与杨修,陆云亦曾见王粲赋集。所以,使得当时的文人学者对赋作有特别的关注,对赋体特点有更加深入的认识。由此,赋体意识也会更加凸显。

南朝齐梁时,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对赋体文学作了一个全面而系统的论述。论述了赋体的源流、发展演变、文体特点以及文体规范。刘勰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26]这种赋体规范的制定应该是建立在赋体观念十分成熟的基础上的。这种成熟的赋体观念,是否又是建立在大量赋集出现的基础之上呢?他们之间应是有关联的。《隋书·经籍志》所载录的众多赋集,均是南北朝时人所撰。这些赋集的编撰时间又主要集中在刘宋与萧梁,而最早的《赋集》是南朝宋谢灵运所撰。因为众多赋集出现于南北朝时期,所以我们把南北朝时期定为赋集的成熟期。而这个赋集的成熟期,又恰巧是赋体文学观念的成熟期。这当然不是一个巧合,而是与其内部有着潜在的关联。

由上可见,从集赋到赋集,是一个人们对赋作文体特点的认识逐步全面深入的过程;是一个人们对赋作文体内核把握更加精粹、恰当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们赋体观念意识慢慢明晰凸显而成熟的过程。当然,赋集的生成与赋体观念的形成是相互的,人们在阅览大量赋作的基础之上形成一定的赋体观念,同时,赋体观念又影响到人们有意识的赋体创作、鉴赏批评及有选择地集结赋作。

【参考文献】

-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85:421.

共外交、商业研究的合作。

(7) 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海外研究及实践队伍。

(8) 重视本土学者的参与,针对一些国家或相关领域的研究形成一个以中国学者为主导的全球性的专家团队,以项目为导向吸收当地及西方学者的加入,这一方法在此前西方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研究中十分有效,特点是收效快、成本低。

(9) 民族学、人类学海外实践可涉及领域:文化领域(宗教、社会文化、国民性)、政治(民族主义、国家变革等)、商业应用研究、公共外交、汉语及中华文化推广。

(10) 研究成果的快速转化,开发一些文化产品,如针对中国公民的“入境须知”“投资指南”等,使用纸质媒体、网络社交平台、手机网络平台等进行发布,为我国游客及商务人士提供信息支持。

作为一个新的领域,民族学、人类学的海外实践将在实践中获得发展。

[参考文献]

[1] 石奕龙. 应用人类学[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

[2] 李秀国. 应用人类学纵横谈:访谢剑博士[J]. 东南文化,1991(5):119-123.

[3] 梁正海.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学应用研究述论[J]. 贵州民族研究,2006(5):86-92.

[4] 周星. 应用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实践[J]. 社会科学战线,1990(3):330-340.

[5] 周大鸣. 应用人类学与中国实践[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133-138.

[6] 胡鸿保. 当前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从学科史和互学科性角度谈起[J]. 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56-59.

[7] 威廉·A. 哈维兰. 当代人类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8] 夏建中. 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9] 林耀华. 民族学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0] 陈庆德. 发展理论与发展人类学[J]. 思想战线,1998(8):45-46.

[11] 王戈. 应用人类学研究的新篇章:“寻求内源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与文化”述评[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195-196.

[12] 唐红丽. 到海外研究一个“真实的世界”[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2-13(A01).

(上接第92页)

[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73:3002.

[4] 王芑孙. 读赋卮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381.

[5] 陈勤建. 文艺民俗学导论序[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10.

[6] 王先谦. 汉书补注[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07.

[7] 纪昀. 四库总目提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8] 范曄.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9] 王充. 论衡[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0] 任继愈. 中国藏书楼(一)[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376.

[11] 萧绎. 金楼子[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844.

[12] 李善. 文选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 陈寿. 三国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4]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15] 严可均. 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16] 欧阳询. 艺文类聚[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771.

[17] 魏征.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18] 陆云. 陆云集[M]. 黄葵,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8:146.

[19] 沈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650.

[20]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392.

[21] 姚思廉. 梁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22] 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23] 李百药. 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24] 令狐德棻. 周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1.

[25] 葛洪. 西京杂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6]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36.

